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朝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汉唐史论 / 隋唐五代 /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

###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

2007-01-20 于赓哲 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点击: 1499

####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

###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

#### 一 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

摘要: 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是8—10世纪民间流行的“伪经”, 它们预言某些种类疾病的发生, 劝人诵佛号、写经、修功德以免灾, 体现出时人对这些疾病的恐惧, 是研究唐五代时期主要疾病种类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通过对写本中病名含义的分析, 可以判断出对当时人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 尤以疟疾为甚, 其次是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难产及其它围产期疾病等等。另外, 写本中体现出来的地域特征表明两经中的各种疾病是唐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疾病种类, 而这些疾病种类与自然环境及唐代历史进程的关系值得关注。

关键词: 新菩萨经; 劝善经; 主要疾病; 唐五代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67(2006)05—0062。

09

收稿日期: 2006-06-20

作者简介: 于赓哲(1971—), 男, 山东乳山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古医疗环境史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和疾病斗争的历史, 日渐进步的生产力和知识水平能帮助一时代的人们逐渐克服或规避眼前威胁较大的疾病, 但却无一例外地发现, 攻破一道防线后, 又会有一道新的防线出现在眼前, 我们仍然没有抵达疾病的“核心阵地”。日本早期医史专家富士川游曾将各个时代“国民常见病”的研究列为医史研究的三大任务之一<sup>①</sup>。其实, 不仅仅是医史, 掌握各个时代的主要疾病种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能为我们了解该时段社会变迁打开一扇新窗口。

###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

目前, 有关唐五代时期的主要疾病种类学界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究其原因可能是史料的局限。面对此课题, 我们首先会想到各种传世医书, 并会试图通过分析医书中对各类疾病关注程度高低来达到目的, 这种方式有时行之有效, 例如医书对于瘟疫都很重视, 而瘟疫始终是古人健康的第一杀手。但有时也不尽然, 六朝隋唐医家的著述, 面对的主要对象往往是达官贵人, 因此对“贵族病”高度重视, 例如寒食散以及皮肤痈疽, 众所周知, 六朝隋唐医家对此极为重视, 医书将其作为重点加以论述,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服食寒食散是贵族习气, 并非全民性的行为。至于痈疽,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其中多数可能是服用丹药引起的，也属于贵族病，宋陈自明《外科精要·序跋》云：“然沾此疾者，又多富贵者，《内经》云：‘大凡痲疽，多生于膏粱之人’。”[1] (p. 441)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或多发性神经炎，而非真菌感染的脚气)的问题也是如此，古代医家对此也很重视，在四十卷的《外台秘要》中，“脚气门”竟占了整整两卷!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威胁当时整个社会的严重疾患，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原本只存在于南方的疾病是在隋朝统一南方之后进入了北方，而患者多为士大夫，“近来中国士大夫虽不涉江表，亦有居然而患之者”[2] (卷七)，侯祥川《我国古书论脚气病》认为脚气病指的是维生素 B1缺乏症，北方士大夫阶层在统一之后受到南方贵族生活习气影响，多食精米，导致维生素B1缺乏而发病[3] (pp. 16~20)，而廖育群《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古人所说的脚气病多数情况下并非维生素缺乏导致，实际上是饵食丹砂、制炼水银中毒导致的多发性神经炎，但他对于脚气病的主要患者是士大夫阶层这一点并无异议[4] (PP. 206~221)。以上这些例子说明，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古代医书中对某种疾病的关注程度来寻求答案。

①这三个任务包括：1. 医学知识的历史；2. 医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3. 疾病的历史，尤其是国民常见病的历史。见《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书店1934年版，《日本医学史》，掌华房1940年版。转引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翻开两唐书的《五行志》或者《册府元龟》，一一记录和罗列各次大疫进而求解呢?这样做恐怕也是有失偏颇，因为瘟疫之外的其它疾病很少被史官记载。至于唐人文集或者诗词一般来说只具备个案研究的意义，欲以此了解整个社会的主要疾病难免挂一漏万。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途径能够帮助我们整体把握当时对社会人群威胁较大的疾病种类呢?毫无疑问，当时人为之恐惧，且恐惧持续时间较长的疾病应就是对社会威胁最大的疾病，笔者认为，敦煌石室遗书中的《新菩萨经》和《劝善经》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这一点。

靠抄写佛经消灾避难是中国古代信徒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民众信佛教以忏悔、作功德为主，传抄、念诵、供养佛典也就成为他们平日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不少经典都有传抄、念诵供养本经将获得多少功德的宣传内容”[5] (pp. 113)。而《新菩萨经》、《劝善经》正是流传于唐五代民间社会的预言灾祸、劝人诵佛写经、修功德以避疫的“经文”，核心内容基本一致，属于佛经中的“疑似”经类，除日本《大正大藏经》第八十五册《疑似部》有收录外，其余藏经均未收录。敦煌石室遗书中有许多写本，散见于英藏、法藏、俄藏、国图藏敦煌文书之中。目前为止，对这两种文书发展演变脉络研究最详细的是袁德领(圆空)先生《〈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苦难经〉校录及其流传背景之探讨》[6]，该文搜集百余件写本，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对其流传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不过并未探讨其与主要疾病的关系。而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则是日本那波利贞先生，他认为《劝善经》中预言的各种疾病代表了唐代“庶民大多所患的疾病”[7] (p. 14)，但那波利贞先生对于其中大多数疾病并未加以判明。另外，马继兴等先生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也认为这些是“当时流行的十种病名”[8] (p. 769)，不过与那波利贞一样，都没有进一步阐释病名含义。

敦煌文书中《新菩萨经》现存的有英藏S. 136、407、414、470、521、622、1066、1592；1689、2320、2649、3091、3417、3126、3442、3790、4479、4747、5020、5060、5244、5654、5256、5303、5929(此文书标为《新菩萨劝善经》)、法藏P. 2668、2953、3117、3857、俄藏Φ215、Дx00299、01251+01464、01609+02035、01708+02399、02057、02586A、02774B+027968、10339、国图藏ha8282(乌三八)、8283(皇六)、8284(字六三)、8285(乃八)、8286(师二十)等等。现根据袁德领先生校录的丙种写本录文如下：

贾耽颁下诸州，众生每日念阿弥陀佛一千口，断 / 恶行善。今年大熟，无人收刈。有数种病死：第一疴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卒病死，第四肿病死，第五产 / 死，第六患腹死，第七血痲病死，第八风黄病死， / 第九水里(痢)死，第十患眼死。劝诸众生，写一本免一 / 身，写二本免一门，写三本免一村。若不写者灭门。门 / 上谤(膀)之，行(得)过此难。但看七八月，三家使一牛，五男 / 同一妇。僧尼巡门，劝写此经。其经西凉州[来]，正月二日 / 盛中时，雷鸣两声，有一石下，大

如斗等，石遂两片，即见此经。报诸中(众)生，今载饶患。/新菩萨经一卷，已亥年五[月]廿日□□。

而《劝善经》内容与此类似，该写本计有英藏S. 417、912、1185、1349、2853、2882、3485、3792、3687、3871、4739、4923、5113、6265、法藏P. 2608、2650、3036、3498、3624(此本标题误写为《劝善文》)、俄藏Дx00327+00360+01452+02978、Дx01246、Дx01786、Дx02753+03079+03080、Дx05463、国图藏 ha8287(裳二十一)、8288(出四)、8289(翔二十二)等等。袁先生校录文如下：

敕左丞相贾耽颁下诸州，普劝众生每日念阿 / 弥陀佛一千口，断恶行善。今年大熟，无人收刈。有 / 数种病死：第一疴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赤白痢死，第四赤 / 眼病死，第五女人产生死，第六水痢[病死]， / 第七风病死。今劝众生，写此经一本免一身难，写 / 两本免六亲。见此经不写者灭门。门上膀之得 / 过此难。无福者不可得见。此经从南来，正 / 月八日雷电霹雳，空中有一童子，年四岁， / 又见一老人，在路中见一蛇，身长万万尺，人头鸟足，遂呼老人曰：“为太山崩，要女人万万众，须牛万 / 万头，著病者难差。写此经者得免此难。不信 / 者，但看四月一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妇，僧尼 / 巡门，劝写此经。若被杂风吹却，不免此难。”圣人流传真言，报诸众生，莫信邪师。 / 见闻者，劝念阿弥陀佛。不久即见太平时。 / 贞元十九年甲申岁正月廿三日出文，五月廿九日写了，故记之也。

由录文可以看到，《新菩萨经》和《劝善经》内容相似，一般结构是这样的：第一部分，劝人念佛行善，托以丞相贾耽奉敕颁下的名义(少部分写本没有“贾耽颁下”字样)，这是为了增添“权威感”。第二部分，预言今年将有某些疾病，会导致许多人死亡，以至于谷物成熟而无人收割，只有抄写经文才能免除斯厄。第三部分，烘托此“经文”的神秘性，或说此文由天而降，或说异蛇劝写此文。

以上诸写本中纪年最早的是武则天长安四年(704)，最晚的是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长安四年写本只有S. 622一本，有武则天新字，题首残缺，《斯坦因劫经录》、《敦煌宝藏》、《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均断为《劝善经》，《大正藏》及袁德领先生均断为《新菩萨经》，笔者赞同后者。文字较后期版本稍简，其中提到的疾病有“第一患死、第二卒死、第三产生死、第四不持斋死、第五肠肚热死。第六自绞死”，不但提到的疾病种类少，而且种类也与其它写本有很大不同，“肠肚热死”为其它写本所无，“不持斋死”和“自绞死”则不属于疾病范畴。可以说此写本是后世写本的“雏形”状态。目前可见的敦煌文书中，此种写本一直到德宗贞元年间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只有S. 622一本，并不算流行。而到了德宗贞元年间则忽然大量出现，内容有所变化，且有部分改名《劝善经》，根据袁德领先生的统计，大多数的写本纪年都是贞元十九年(803)，也有部分采用干支纪年(吐蕃纪年)。值得注意的是，贞元十九年时敦煌早已陷于吐蕃之手，而此写本还能如此广泛流传，可见其在内地流行之势早已汹汹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此写本大量出现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贞元时期多年旱灾引发的疾病恐慌有关。根据《册府元龟》卷一四四《帝王部·弭灾》记载，德宗贞元元年(785)、二年(786)均有旱灾，而贞元十一年(795)到十九年(803)的旱灾更为严重，以致皇帝屡次遣使分祷山川、巡覆囚徒，惶恐之情跃然纸面。那么灾荒与疾病恐慌有什么关系呢？灾荒往往造成环境的失衡以及人口和牲畜的集中死亡，恶劣的环境和尸体处理的不及时往往引发瘟疫，而灾民流动又会加速疫情的扩散。古人深谙两者关系，明代名医张景岳曾云：“大荒之后必有大疫。”[9](卷一三)这堪称历史经验的总结。所以贞元年间持续不断的旱情很可能在唐人心底唤起对未来疾病的恐慌，在未来灾难的面前寻求宗教的慰藉是人之常情，《新菩萨经》、《劝善经》就是这种恐慌的产物。有人在原有的长安四年写本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当时常见且较为严重的疾病名称，再托以丞相贾耽的名号构成新的版本，结果不胫而走，广泛流行，以至于远在西陲异域的敦煌也出现了大量写本。

虽然很多写本最后都有“贞元十九年”题记，但实际上只是依样抄录，并非真的都是贞元十九年写成，例如许多写本将贞元十九年标为“甲申岁”(例如S. 1349、S. 3792、S. 3871、S. 5113、P. 2624、P. 2650、P. 3624等)，而这年干支实际上是癸未，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某个写本误写成“甲申”，后继者不辨正误原样照抄(凡是干支标为“甲申”的写本内容都基本一致，属于袁德领先生划分的丙类写本)，说明这些写本距离贞元十九年可能已经有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否则恐不至于有这么多人轻易地把干支搞错。根据袁德领先生考证，诸写本中年代最晚的是宋太祖乾德五年

(967), 也就是说目前可见的《新菩萨经》、《劝善经》起码有着长达二百年的历史[6](p. 59), 考虑到敦煌文书时间下限截至11世纪初, 所以还不好断言此后类似内容的写本又流传了多长时间。写本时间跨度如此之大, 数量如此众多, 其中反复提及的各类疾病自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新菩萨经》、《劝善经》中究竟提到了哪些疾病呢? 我们在袁文表格的基础上, 将现有的《新菩萨经》、《劝善经》写本中提到的各种疾病分类排列成表1①。

表1 《新菩萨经》、《劝善经》写本所记疾病分类表

内容	新菩萨经			劝善经
	甲本	乙本	丙本	
病名	第一患死 第二卒死 第三产生死 第四不持斋死 第五肚肠热死 第六自绞死	第一病死 第二卒死 第三赤眼死 第四肿死 第五产(生)死 第六患腹死	第一疴病死 第二天行病死 第三卒病死 第四肿病死 第五产生死 第六患腹死 第七血痢死 第八风黄病死 第九水痢死 第十患眼死	第一疴病死 第二天行病死 第三赤白痢死 第四赤眼病死 第五女人产生死 第六水痢(病死) 第七风病死
写本编号	S.622	S.3091 <sup>②</sup> 、 S.3442、 北8286、 Φ215、	S.407、S.414、S.470、S.521、S.1066、 S.1592、S.1689、S.2320、S.2649、S.3126、S.3417、S.3790、S.4479、S.4747、S.5020、S.5060、S.5256、S.5303、S.5654、S.5929、北8282、北8283、北8284、北8285、P.2668、P.2953、P.3117、P.3857、Дx00299、Дx01251 + 01464、Дx01609 + 02035、Дx01708 + 02399、Дx02057、Дx02586A、Дx02774 + 02796B、Дx10339	S417、S.912、S.1185、S.1349、S.2853、S.2882、S.3485、S.3792、S.3687、S.3871、S.4739、S.4923、S.5113、S.6265、北8287、北8288、北8289、P.2608、P.2650、P.3036、P.3624 <sup>③</sup> 、P.3498、Дx00327 + 00360 + 01452 + 0297、Дx01246、Дx01786、Дx05463

从中我们看到, 丙本《新菩萨经》和《劝善经》不但提到的疾病种类多于其它版本, 而且现存写本数量众多。所以, 下文将主要依靠丙本《新菩萨经》和《劝善经》发覆阐幽, 了解威胁唐人健康的主要疾病。

①S. 5244号《新菩萨经》、Дx02753+03079+03080号《劝善经》由于残损过甚而不列在其中。

②此写本所列疾病为病死、卒死、赤眼死、产生死、患腹死, 比起标准的乙种写本少一“肿死”。

③此写本原名为《劝善文》, 误, 按敦煌文书中另右《劝善文》, 内容与《劝善经》并不相同。

### 两经所反映出来的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要判断上表所列疾病究竟何指并非容易的事情, 因为古今医学概念不同, 古人可能将几种现代医学看来完全不同的疾病归结为一种疾病①, 有时, 现代概念的同一种疾病根据不同阶段和部位的症候又会被古人视为数种疾病②, 也有些疾病的命名由于地域的不同而相异③, 本文所讨论的《新菩萨经》、《劝善经》是民间传抄的写本, 文辞粗陋, 有些疾病名称甚至在当时也不算“标准术语”, 再加上缺乏更具体的症状描述, 因此, 要准确判断其中所提到的疾病究竟何指并非易事。不过, 结合两部写经和其它史料, 我们还是可以对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 (一) 疴病、天行病、痢病

丙本《新菩萨经》和《劝善经》都将“疴病死”及“天行病死”排在了所有疾病的第

一、二位。这并不是偶然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传染病的的确是威胁唐人健康最主要的疾病：

1. 疟疾。中国历史上疟疾所引起的大规模疫情屡见不鲜，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威胁社会的最主要疾病之一。“疟疾”由疟原虫经按蚊叮咬传播，俗称打摆子，分为恶性疟疾、间日疟、三日疟等。该病先秦已存在，而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与疟疾的蔓延可能也有关系。由于古人全然不知疟疾与蚊子叮咬有关，更不知疟原虫才是真凶，一般把疟疾归结为邪气干犯，例如《素问·疟论篇》及《诸病源候论》卷一一《疟病诸侯》等，这样的理论对于防控疟疾自然毫无裨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疟疾怀着极大的恐惧，医理无法安抚之下，迷信观念就大行其道，古人认为疟疾之行乃是“疟鬼”作祟，韩愈有《遣疟鬼》：“屑屑水帝魂，谢谢无余辉。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10]（卷三）这里描述了医师、针灸师、咒禁师各施其能对付“疟鬼”的场景，皮日休《祝疟病文》将疟疾的发作与人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疢之能祸人，是必有知也”，既然如此，那就应该降临在不忠、不孝、谄媚之徒身上[11]（卷五）。《太平广记》中也有许多唐人对付“疟鬼”的故事，例如卷二一〇引《八朝画录》“顾光宝”条、卷二七八引《广异记》“薛义”条、卷二九二引《幽明录》“阳起”条、卷三一八引《录异传》“邵公”、“吴士季”条等等。据笔者统计，孙思邈《千金翼方·禁经》的106项咒禁符印疗法中，用于对付包括“疟鬼”在内瘟疫元凶的有30项，占总数近1/3。同样的，盖建民先生根据陆修静、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对道教各种治病符进行了统计，其中理瘟疫符88道，占总数约1/4[12]（P. 285），古代那些与鬼神相联系、咒禁祝由之术大行其道的疾病，往往是十分棘手、死亡率较高的疾病，所以，如此众多的有关“疟鬼”的传说和厌胜之术可以反衬出“疟疾”给唐人造成的心理恐慌。这样我们也就理解“疟病死”为什么会被排在《新菩萨经》和《劝善经》诸病之首了。

2. 天行病。“天行病”具体何指值得讨论，很有可能是现代概念多种传染病的总称。刘宋时期陈延之《小品方》云：“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2]（卷九）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向我们证实那时民间有“天行温疫”的俗语称呼，而《新菩萨经》、《劝善经》中的“天行”很有可能就是这一称呼的简称。天行温疫究竟指的是什么？“天行”又名“时行”，陈延之是这样解释的：“凡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所谓“温疫”并不是“瘟疫”的异写，而是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发病急骤，患者临床表现相同，且病情危重，并可引起大流行。如西医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鼠疫、斑疹伤寒、流行性乙脑膜炎、传染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急性传染病出现大流行时，即统称温疫”[13]（p. 502）。由此可见，所谓“天行温疫”实际上是多种急性传染病的统称，与传统医学广义的“伤寒”定义（一切外感热病）大同小异，所以民间才会“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所以，两经对“天行温疫”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普通民众对“伤寒”的重视。而伤寒往往被古人视为大敌，《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将伤寒列为“百病之本”的第二位，仅次于中风。

①如“瘴气”可能包括了疟疾、出血热、痢疾、黄疸等，“蛊毒”可能包括了血吸虫病、肝硬化、癌症、痢疾等。

②例如癌症可能被视为恶疮、痈疽、瘰疬、内痈、瘀血、积聚痼症等等。

③例如肺结核在各地有“伏连”、“传尸”、“骨蒸”、“殍殍”等称呼。

3. 痢疾。《劝善经》第三位为“赤白痢”，第六位为“水痢”，丙本《新菩萨经》则将水痢排在第九位，《诸病源候论》卷一七《痢病诸侯》有“赤白痢候”：“重者，状如脓涕而血杂之；轻者，白脓上有赤脉薄血，状如鱼脂脑，世谓之鱼脑痢也。”可见赤白痢由粪便中夹杂血、脓而得名，一般情况下可能指的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中毒性痢疾，中毒型痢疾是急性痢疾的爆发型，粪便中夹杂红白，高烧、腹痛，夏秋常见，进展快，预后差，死亡率较高①。至于“水痢”，唐代名医许仁则云：“其水痢者，本由脾气热，消谷作水，谷气不得消，便生此痢... 又水痢之候，心腹甚痛，食无妨，但食后即痢，食皆化尽，唯变作水谷无期度，多食多下，少食少下。”[15]（卷二五）从症状描述来看，似乎接近宋以后医学家所谓“泄泻”，即“以大便次数增

多，粪便稀薄或混杂未消化食物，甚至水样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又称腹泻，也可作为某些疾病的症状出现... 西医的消化器官发生功能或器质性病变导致的腹泻，如急性肠炎、肠结核、肠功能紊乱、肠道易激综合征等，在其病程中以泄泻为主要症状时，均可参照本病辨治。”[13] (p. 534) 另外，也不能完全排除霍乱的可能性。乙、丙本《新菩萨经》中的“患腹死”，含义过于笼统，难以判断其性质，《左传·昭公》：“雨淫腹疾”，与“患腹”一词接近，唐孔颖达疏曰：“雨多则腹肠泄注”[16] (卷四一)，可见“患腹死”大约指北方夏秋多雨季节的腹泻，范行准认为这可能是“因天寒饮冷而发生的胃原性腹泻一类急性肠炎。”[17] (p. 142)

唐人对疟疾、天行病、痢疾的重视也可以在唐代制度中找到痕迹，《唐六典》卷十四“太医署令”条注：“(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疮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卷三十“三府、都护、州县官吏功曹、司功参军”条：“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中央及地方医疗机构每年须常备治疗伤寒、时气、疟疾、痢疾的药物，也可证明这些疾病危害程度较大，唐人极为重视②。

## (二) 其它疾病

1. 卒病、风病：《新菩萨经》中“卒病”被排在第三位，而《劝善经》中“风病”排在了第七位，《新菩萨经》无“风病”，《劝善经》中无“卒病”，因为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卒”通“猝”，取其发作猝急之意，《备急千金要方》卷八《诸风》：“夫诸急卒病，多是风。”也就是说“卒病”一般情况下都是指风病，“风”含义多样，即是一种疾病的称呼，有时也指致病的原因，即所谓“六淫”之一，不过既然是“死病”，那么指“中风”的可能性更大，即脑栓塞、脑梗塞、脑溢血之类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往往与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脏疾病有关，唐五代皇室、贵族、士大夫中多见此病，有浓厚的贵族病色彩，在当时来说高发人群规模有限，所以《新菩萨经》、《劝善经》都没有把它列在第一位。

① 《千金翼方》卷一三《辟谷》还有“赤白痢积年不差”、卷二四《疮痈》有“赤白痢久不差”，此则与中毒性痢疾不符，属于慢性痢疾，另外中医所谓“阴虚痢”、“劳痢”也都有痢下赤白的症状，不过考虑到《新菩萨经》、《劝善经》中强调的都是致死率较高的疾病，所以笔者认为写本中的“赤白痢”应该指的是中毒性痢疾。

② 《唐六典》中“时气”与“伤寒”并列，所谓“时气”极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时行”，而前引《小品方》证实人们有时将“伤寒”与“时行”等同视之，大概是出于此原因《唐六典》编纂者将伤寒与时气相提并论，概依从当时之观念。

2. 肿病：乙本、丙本《新菩萨经》都将“肿病”排列在第四位。笔者认为，“肿病”很可能是“水肿病”的简称，按照现代医学观念，水肿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类症状。过多的液体在组织间隙或体腔中积聚，称为水肿，能引起水肿的疾病很多①，被古人统统划为一类，这其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应该是肾炎、尿毒症、糖尿病和肝硬变等。

3. 产生死：甲本《新菩萨经》将妇女“产生死”列为诸病第三位，乙、丙本《新菩萨经》和《劝善经》不约而同地将“产生死”列在诸病第五位。古代妇女生产时的高风险于今人殊难想象，南朝宋人陈延之《小品方》云：“夫(生产)死生皆有三日也，故使妇人产，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既得生产，谓之免难也。亲属将猪肝来庆者，以猪肝补养五内伤绝也，非庆其儿也。”[14] (卷二三) 一句“法如就死也”，将古代妇女生产之危险呈现于我们面前。这种情况下，“产生死”列入两经也就不奇怪了。

4. 血痈：丙本《新菩萨经》中，“血痈死”被列在第七位。血痈究竟何指已不好判断，唐宋医书似未有此名词。按中医理论，痈分内外，外痈即体表的脓肿(可能还包括急性淋巴结炎和部分蜂窝组织炎症)，《灵枢·玉版篇》：“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许多痈红肿热痛，被民间叫做“血痈”也未可知。体表脓肿对于现代人来说威胁不是很大，但对于古人来说是很危险的疾病。

5. 风黄病：丙本《新菩萨经》中第八位是“风黄病”。《诸病源候论》卷一二《黄病诸候》专论各种黄病，风黄只是其中之一：“凡人先患风湿，复遇冷气相搏，则举身疼痛，发热而体黄也。”这可能是胆结石的症状，胆结石所造成的疼痛往往由上腹部放射至肩、背部，符合“举身疼痛”的描述，且低烧、恶心呕吐、寒战、大汗淋漓，部分患者会有黄疸出现，符合“发热而体黄”的描述。而宋徽宗敕撰《圣济总录》云：“病人爱笑，腰背急，手足强，口干，舌上生疮，三部脉乱，此是风黄。”[18]

(卷六一)此则与肝硬变症状相符者多,例如手、足及头颈部震颤、肌肉强直、发生舌炎等。也就是说宋代《圣济总录》与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风黄”并非同类,那么敦煌写本中的“风黄”究竟何指?笔者暂时还没有找到其它证据来研判这个问题,考虑到《新菩萨经》、《劝善经》中所提到的疾病应该是常见病,笔者倾向于“风黄”同时包括了能引起黄疸的各种病毒性肝炎、肝硬变及胆结石等。

6. 赤眼:乙本《新菩萨经》将“赤眼死”列在第三位,丙本则将“患眼死”列在第十位,疑二者同为一病。既然是“死病”,应该不同于常见的急性结膜炎等病,《诸病源候论》卷二八《目病诸候》列有“目赤痛”,值得关注,人卫版《诸病源候论》校注者解释说:“目赤痛,是许多眼病之共同见症,而其成因不一”[19](p. 778)所谓“赤眼”有可能是某些疾病的外在病征,并非纯粹的眼科疾病,最有可能的是眼球玻璃体出血,“常见的玻璃体出血的病因有:眼外伤或眼内手术;视网膜血管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病、动脉硬化、视网膜静脉周围炎及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等;血液病,如恶性贫血和白血病等”[20](p. 91)。既然《新菩萨经》将“赤眼死”列为重大死因之一,那么,它很可能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和白血病引起的玻璃体出血。

至此可做一总结:威胁唐五代时期人健康的主要疾病是传染病,这符合一般的历史常识,但是唐五代的传染病也有其自身特点,即疟疾是最主要的种类,天花虽然已经早已在六朝时期传入中国<sup>②</sup>,但是还没有像清代那样形成巨大威胁,鼠疫虽然存在,却没有金、明时那般酷烈。另外,“骨蒸”等结核性疾病也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外,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难产及其它围产期疾病、皮肤化脓性疾病、新陈代谢疾病也对唐人构成很大威胁。

①例如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糖尿病、肝硬变(常与腹水相伴产生)、血栓性静脉炎、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下腔静脉阻塞综合症、血管神经性水肿、妊娠、丝虫病引起的象皮腿、荨麻疹、红斑狼疮等。

②范行准先生认为天花自刘宋元徽四年(476)由西域传入中国,见《中国预防医学史略》,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版,第106—110页。

### 两经的地域性及主要疾病与自然环境关系蠡测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新菩萨经》、《劝善经》所反映的疾病种类带有一定的地域性,作者应为北方人,最明显的证据是两种写经中都没有提及“瘴气”,而“瘴气”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南方首要疾病,《岭外代答》卷四《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而《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引《备急》云:“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这段阐述是否完备暂且不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唐代“瘴”字适用于南方,“疟”字适用于北方,只提及“疟病死”而不提“瘴气”,反映出两经始作者可能长期生活在北方地区。

所谓瘴气,并非确有一种气体闻之则病,它实际上是长久以来北方人对于神秘南方的一种想象模式,与其说是一个自然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南方湿热地区许多疾病对于初涉此地的北方人来说较为陌生,所以会产生“瘴气”的观念,而这些疾病中,恶性疟疾肯定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21](pp. 194~206)。以现代情况来看,中国南方的疟疾多为恶性疟,北方疟疾多为间日疟及三日疟,唐代是否如此值得探讨,因为疟疾的分布与气候和水环境密切相关,假如气候足够温暖,水环境足够丰富,就可能导致恶性疟原虫广泛分布,中华按蚊、嗜人按蚊、微小按蚊等传播媒介也能达到一定密度(现代嗜人按蚊、微小按蚊多生存于北纬33°以南),从而使恶性疟疾广泛传播。关于唐代气候问题,目前尚无定论,竺可桢认为7世纪中期到10世纪中国气候处于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22](pp. 15~38)。而满志敏对竺可桢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提出异议,认为唐朝前150年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并不特别温暖,后150年则转向寒冷[23](pp. 1-15)。而牟重行则对竺文包括唐代气候在内的一系列结论都提出质疑,基本否定其观点[24]。而蓝勇则对竺可桢的观点予以一定的支持[25](pp. 4-15),对此发表观点的还有吴宏岐[26](pp. 31-38)等。至于古代北方地区的水环境,肯定远比今日丰富,以唐代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为例,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称赞的“八川分流”的盛况,如今只可用“不绝如缕”来形容,汉唐时期盛极一时的关中水利工程也可能造成适宜蚊子生长的水面广泛分布。目前为止,单从传统史料中探索北方地区疟疾的种类比较困难,医书

中几种疟疾常常并列，看不出明显的主次，其它史料往往笼统提及“疟”，无法让我们明确区别其种类。杜甫曾经长时间患疟疾，其诗《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27] (卷一〇)其中“隔日搜脂髓”一句可证明其所患乃是间日疟。遗憾的是，类似的能借以判断疟疾种类的史料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持数据统计。本课题的解决，还是需要气候、环境史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古今中外历史进程受疫情左右并非罕见，唐前期是中古文明的顶峰，其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尚在北方地区，而北方地区最主要的传染病并非天花、结核病、鼠疫等恶类，而是疟疾，假如这种疟疾主要是危害程度较低的间日疟、三日疟，那么是否可以说唐前期的繁盛得益于疫情威胁程度较低？东汉建安年间有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28] (卷七四二)明代崇祯年间亦有大规模鼠疫[29] (pp. 17-32)，两场疫情加速了汉、明王朝的覆灭，而安史之乱后衰弱的唐政权得以维系一个半世纪，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未曾发生大规模疫情？已有学者统计指出大规模疫情在唐代处于低发期[30] (pp. 97~109)，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统治者对于民间疾苦的漠视，依靠正史进行的类似统计并不见得能站得住脚[31] (pp. 69~74)，实际情况的判断恐怕需要多领域研究的共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仅仅是一个“破题”，由两部佛经所体现出来的唐人对疾病的恐慌人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主要疾病种类，并以此为根据对唐代的历史进程与疫情高低的关系提出了猜想，应该说后续的话题更有意义，但篇幅有限，未能尽意，请容以后再考。

#### 参考文献：

- [1] (日)冈西为人. 宋以前医籍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 [2]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3] 侯祥川. 我国古书论脚气病[J]. 中华医史杂志，1954，(1).
- [4] 廖育群. 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3).
- [5] 方广颀. 佛教典籍百问[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
- [6] 袁德领. 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苦难经校录及其流传背景之探讨[J]. 敦煌研究，1992，(1).
- [7] (日)那波利贞. 唐朝政府的医疗机构及庶民疾病救济小考[J]. 史窗(17~18)，1960.
- [8] 马继兴.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9] 张景岳. 景岳全书[M]. 上海：广益书局，1933.
- [10] 韩愈. 韩愈全集校注[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 [11] 皮日休. 皮子文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2] 盖建民. 道教医学[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 [14] (日)丹波康赖. 医心方[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15] 王焘. 外台秘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16]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7] 范行准. 中国病史新义[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
- [18] 赵估. 圣济总录[M]. 上海：文瑞楼，1919.
- [19] 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992.
-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21] 左鹏.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2004，(1).
- [22]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
- [23] 满志敏. 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A]. 历史地理：第八辑[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24] 牟重行. 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
- [25] 蓝勇. 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 [26] 吴宏岐，党安荣. 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J]. 第四纪研究，



1998, (1).

[27]杜甫. 杜工部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28]李防.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29]曹树基.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J]. 历史研究, 1997, (1).

[30]靳强. 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A].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C]. 武汉: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 2003.

[31]冻国栋. 读独孤及《吊道瑾文并序》书后[A].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2)[C]. 武汉: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 2005.

The Disease Panic Behind Book of New Buddha and Book of Good Behaviors  
— On The Five Main Diseases in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Yu Gengzhe

(History Colleg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ook of New Buddha and Book of Good Behaviors are the so called "pseudo - classics" popular in 8th to 10th centuries which predict the initiation of certain diseases, therefore persuade people to converse to Buddhism by copying Buddhist classics and doing good deeds to escape disaster. The two books are the precious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the main diseases in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y express people' s panic at those diseases at the time.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sease names appeared in the manuscripts,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 threatening focuses 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among which ague is the most serious one besides diseases of cardio - vascular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urinary system and dystocia. The features of landscape depicted in the manuscripts also indicate that disease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 main illnesses suffeting North China in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diseases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Book of New Buddha; Book of Good Behaviors; Main Diseases;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